

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国家神道

王海燕

内容提要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精神支柱国家神道与军事侵略相呼应,在中国的广泛地区,尤其是军事、经济要地建立神社。在华神社作为日本本土神社的延伸,所祭之神是以天照大神、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神灵皇祖,建筑式样也是日本式样,被视为“八纮一宇”、“肇国大精神”的象征性建筑物。日本政府、军部及神道界所设立的在华神社不仅扮演着辅助军事侵略、实施文化侵略的角色,是妄图使中国人丧失民族性的“皇民化”政策中的|环,而且也是统制在华日本人思想意识的工具。

关键词 日本侵华战争 国家神道 在华神社

神道是以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等传统信仰为基础,吸收佛教、儒教等外来思想而形成的日本民族宗教。在日本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神道曾对民族文化的发展以及吸收外来文化有过积极的作用,但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大约 80 年间,由皇室神道和神社神道构成的国家神道,成为近代天皇制国家的统治工具,不仅在对日本国民的精神进行统一化的过程中,起到重大的作用,而且还为日本极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形提供了思想基础。特别是明治中期以后,随着对外侵略的扩大,国家神道作为日本殖民地统治的手段还发挥着精神侵略的作用。

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日本,以“上下一致,不生疑惑,大充兵备,扬国威于海外万国”^①、“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国”为对外国策,将邻国列为它的侵略、掠夺对象,通过侵略战争先后将台湾、朝鲜半岛、库页岛等地区变为殖民地的大部分地区,并占领了中国、东南亚等地的大部分地区。自中日甲午战争至太平洋战争期间,在这些殖民地及占领地,陆续建立了许多神社。作为祭祀神道诸神场所的神社,是神道的象征性建筑物。因此,本文以日本在中国设置神社的进程为主线,剖析国家神道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活动及其战略意图。

一 日本国家神道的形成

为了认识日本神社在侵华战争中所起的作用,首先有必要对明治维新以后的神道与国家、皇室一步步结合的历史作一简略的回顾。

众所周知,在江户时代,幕府对神道虽然采取保护政策,但神道界的活动是受到严格控制的。1665年,江户幕府公布了体现其宗教统制政策的法令——《诸社祢宜神主法度》,其中第 1 条就规

^① 明治元年正月宣告开国亲善方针的敕语,载《复古记》卷 20 转引自大久保利谦等编:《史料による日本の歩み》近代篇,吉川弘文馆 1967 年版,第 118 页。

定作为神职人员,其职责在于专心学习神祇道,勤于神事祭祀,若有怠慢,则将被取消神职。幕府如此严格要求,其用意是为了防止神社势力的增强。江户时代中、后期,主张日本文化独自价值观以及道德规范的国学和国学神道(亦称复古神道)兴起。国学神道中的皇国主义理论被幕末的尊皇倒幕派奉为重要的行动指南,在“尊皇倒幕运动”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1867年12月9日,在王政复古的大号令下,明治新政府成立。新政府以祭政一致为政治理念,将神社作为国家的宗祀,推行由政府统一管理全国神社的政策。新政府在1868年1月设置的三职七科官制中,就有神祇事务行政机构——神祇事务科。^①1868年3月,太政官宣布恢复神祇官的布告:“此次王政复古,基于神武创业之始,诸事一新,恢复祭政一致制度。首先恢复设置神祇官,然后逐渐复兴诸种祭仪。”^②同年10月,明治天皇在诏书——《冰川神社亲祭诏》中指出:“崇神祇、重祭祀,皇国之大典、政教基本。”^③1869年7月,明治政府进行官制改革,将太政官下属的神祇官升格,并列于太政官。同时,国家对全国神社、祭祀制度也进行了整顿和完善。1870年1月,明治天皇发布《宣布大教诏》下令设立宣教使官职,负责向国民“宣扬惟神之大道”(神道)事宜。^④宣教使的设置旨在教化国民“敬神”并奉戴天皇,是明治政府谋求神道国教化的具体措施之一。1872年3月,政府又设置教导职代替宣教使从事教化国民的神道宣教活动。为了扩大宣教活动的声势,政府还借助了佛教势力,因此当时不仅有神道教导师,同时也有佛教教导职以及一般教导职。1875年3月,由神道教导师组成的布教、教义研究机构——神道事务局成立,旨在以伊势神宫为中心,联合全国的神社进行教化国民运动。1880年,围绕着神道事务局新筑神殿中所祭之神,神职人员分成伊势与出云两派,发生了著名的“祭神论争”。伊势派主张奉祀造化三神(天之御中主神、高皇产灵神、神皇产灵神)及天照大神,但是出云派则认为还应该并祀大国主神。两派各执己见,相持不下,直至1881年2月,明治天皇出面裁决,神殿的祭神定为遥拜宫中三殿的天神地祇、贤所(神镜)、皇灵(历代天皇亡灵),争论才得以平息。同时,皇族由栖川宫帜仁亲王出任神道教导师总裁。对皇祖皇宗的崇敬表明神道与皇室、国家的结合进一步深化,国家神道日渐形成。

1900年4月27日,明治政府在内务省下新设神社局,以主管神社的行政,而其他宗教的行政则归宗教局管理,由此从制度上明确区别神社与其他宗教的不同。^⑤明治末大正初,日本政府调整、修定了一系列有关神社的制度,如颁布《神社祭式行事作法》(1907年6月)、《神社财产》(1908年3月)、《神社财产登录》(1908年7月)、《神宫神部署官制》(1912年4月)、《神宫神职服制》(1912年12月)、《神宫祭祀令》(1914年1月)等一系列法令,使神道进一步与一般宗教相区别,成为专事于“国家宗祀”的宗教信仰。

1914年8月,日本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向德国宣战,并出兵占领中国山东和南洋群岛的德国殖民地。此时神道的“敬神崇祖”成为精神上统一国民的核心。时任内务大臣的大隈重信就曾经这样说过:“国民齐心坚定神祇敬肃之念,振奋军国民心,乃是此际堪为切望之事。”^⑥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内实行军事法西斯独裁,对外挑起战争。为了得到国民对侵略战争的支持,日本政府更加借重神道统制国民精神的能力。在法西斯体制下的“日本神国论”中,神社被认为是“惟神

① 1868年2月,三职七科制改为三职八局制,神祇事务科升格为神祇事务局。同年闰4月,随着太政官制的实施,神祇事务局被废止。

② 明治元年三月十三日的太政官布告,转引自大久保利谦等编:《史料による日本の歩み》近代篇,第174页。

③ 转引自阪本健一:《明治神道史》,载宫地直一编:《神道讲座(别卷)——神道史》原书房1981年(新装版),第208—209页。

④ 转引自阪本健一:《明治神道史》,载宫地直一编:《神道讲座(别卷)——神道史》第211页。

⑤ 阪本是丸:《国家神道形成过程の研究》,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305—311页。

⑥ 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帝国议会众议院议事速记录34》(第40回议会,1917年),东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4—425页。

之大道”的最高体现,显现日本国体且永远“镇护皇国”。同时,祭祀战亡者的招魂社也被称为护国神社。神社一时间成为祈祷军事战胜、武运长久等配合战争活动的重要场所。此外,政府的神社事务机关规模也进一步扩大。1933年以后,内务省神社局不但新增了科室,而且职员人数由51名增至150余名。^①1940年11月,昭和天皇发布第736号敕令《神祇院官制》,宣布为加强神道行政机关,创设神祇院。神祇院所掌管的事务包括4项:(1)神宫;(2)官国币社以下神社;(3)神官及神职;(4)敬神思想的普及。^②其中,第4项“敬神思想的普及”实际上就是宣扬“日本神国论”,也就是说,神祇院不仅是管理全国神社的行政机关,而且还是负责国民思想意识同一化的国家机构,这充分表明神道界是日本法西斯统治体制中的重要基石。

在上述背景下,伴随着对外的侵略扩张,日本在中国、朝鲜半岛、库页岛等地建立了许多神社。

二 日本在中国建立神社的进程

(一)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的神社设立

日本神道最初渗入中国,是从中日甲午战争后侵略台湾开始的。为了尽速完全占领台湾以及澎湖列岛,1895年5月,日本任命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同时日本近卫师团强行侵入台湾。当时,近卫师团中有两名随军神宫教布教师,一位名叫山口透,另一位名叫甲斐一彦。进入台湾后,他们除了慰问侵略军官兵之外,还上书桦山资纪总督,极力主张在台湾本岛及澎湖岛创建和设立神宫教台湾本部,以作为“斯道扩张之根据地”;同时还要求建立以吊慰镇祭陆海军人战死者英灵的“招魂社”。^③1900年9月,日本政府在台北建造官币大社台湾神社^④,翌年10月完工,首任宫司即为山口透。台湾神社是日本在中国建造的第一座神社^⑤,祀奉死于台湾的近卫师团团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和日本的开拓三神(大国魂命、大己贵命、少彦名命),1944年增祀天照大神,改称台湾神宫。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止,日本占领者先后在台湾各地,包括台南、台中、新竹、嘉义、开山、宜兰、基隆、高雄、台东、花莲、阿绿、澎湖等重要城镇建立了数十座神社,其中大半是台湾神社的地方分社。这些神社所祀奉的神虽各有不同,但大多都包括侵略者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能久毕业于陆军户山学校,1884年升为陆军少将,1892年为中将,曾任第四、第六师团长参加甲午战争。台湾被割让后,他作为近卫师团长于1895年5月,率日本军队在台湾的澳底登陆,然后向台北、台中、台南等地扩展,但是其所到之处都遭到了台湾人民的反抗。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字,5万多侵略军,战死、病疫死亡以及受伤人数多达3万余人(其中死亡4.8千人,伤2.7万人)。^⑥1895年10月,北白川能久也丧命于台南。台湾的神社祭祀这样一位沾满台湾人民鲜血的侵略军头子,足见神社是日本侵略的象征。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和俄国为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利权,产生了尖锐的矛盾。1904年2月,日俄相互宣战,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动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最终,以俄国战败而告终。

① 赤泽史朗:《近代日本の思想动员と宗教统制》,校仓书房1985年版,第229页。

② 《神祇院官制》(昭和十五年敕令736号),载神祇院总局编辑:《最新神社法令要览》,京文社1941年版,第70页。

③ 小笠原省三编述:《海外神社史》上卷,海外神社史编纂会1953年版,第54—55页。

④ 日本近代社格制度将神社自上而下分为官社(官币社和国币社)、诸社(府县乡村社)及无格社三个大等级。其中,官社又可细分为官币大中小社及国币大中小社,其经费皆由国库负担。

⑤ 日本在台湾所设的第一个神社是位于台南的开山神社,它的前身为祭祀郑成功的延平郡王祠(开山王庙、开台圣庙)。1898年,日本改王祠为神社。

⑥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1853—1918),东京:每日新闻社1964年版,第189页。

1905年9月,日俄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同年11月,日本在安东(今丹东)设置了东北地区的第一个神社——安东神社。安东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面对鸭绿江,与朝鲜半岛仅一江之隔,是日本通过朝鲜半岛直接进入我国东北地区的必经之道。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就曾占领安东,并设置殖民地统治机构——民政厅。1904年5月,日俄战争的初期,日军士兵渡过鸭绿江再次占领安东,同时设立了东北地区的第一个军事殖民地统治机构——安东县军政署。日本的军政署和神社都首先建在安东,决不是偶然的,这反映了神道的渗透是与军事入侵相辅相成的,虽然二者的侵华表现形式不同,但性质是完全相同的。

在《朴茨茅斯条约》中,俄国将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及其附近的领土和领水)的租借权、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间的铁路及其所有支线以及附属的一切特权无偿地转让给日本。获得此项权益之后,日本于1906年11月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与军事侵占、经济掠夺的进程同步,日本在满铁沿线重要城镇及其周边地区建造神社的步伐也在逐渐加快。据日本满洲神职会的统计,截至1930年,日本在旅顺、大连地区及满铁附属地共设神社42座,其中旅顺、大连地区10座、满铁附属地31座,领事馆管辖内1座。^①这些神社成为神道布教活动的重要据点,其所祭之神,主要有天照大神、明治天皇和大国主神。^②

(二)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神社设立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进一步扩大侵华的历史事件。在事变后不到100天内,日本侵略军迅速地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战事上的进展,使日本国民沉醉在“胜利”的狂热之中。在日本国内,神社成为人们祝愿日本“国威宣扬,武运长久”的场所,在乡军人会、青年团、妇女会、学校、自治组合、氏子等所有地区性组织、团体,纷纷集体参拜神社。与此同时,慰祭侵略战争中死亡者的“招魂社”也在日本各地建立。这时,神道界人士纷纷著文,表示要乘军事的“胜利”,在中国推进神道布教活动。有人宣称,在被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最紧急的事业是设立宣传神道精神的相应机关”。^③有人更是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如日本全国神职会和皇典讲研究所计划建立“满洲国祀官养成所”,以培养“掌握祭祀,实现大满洲建国理想的人才为目的”^④;又如奉天神社的山内祀夫要求在奉天(沈阳)设立“镇守全满洲的满洲神宫”,使其成为“人心统一,王道发现,彼此和合为乐,满蒙发展的精神中心,如同欧美人移居人烟稀薄的殖民地时,首先要建立教堂,以会同侨民、净化颓废怠惰之心,进而教化新附之民”。^⑤就在日本神道界鼓噪要在中国东北地区推进神道建设的同时,有两件事正在日本国内和中国东北紧锣密鼓地策划着,一是以拓务省为主,得到军部支持的向中国东北地区武装移民;二是建立以清朝废帝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上述两事在1932年得以实现,3月伪满洲国宣布建立,8月日本内阁通过了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的预算,自此大量移民开始涌入中国东北地区。在上述背景下,中国东北地区的神社数也随之激增,凡有日本人居住的地方,或有日军驻扎的地区,皆陆续建立了神社。1940年,在原关东军参谋长,后为伪满洲国祭祀府总督的桥本虎之助的推动下,伪满洲国在长春的宫廷府内建造建国神庙,以祭祀天照大神,神社所供神体是溥仪从日本伊势神宫带回来的镜子。同年,伪满洲国政府还设立了建国神庙的“摄庙”——建国忠灵庙,供奉为伪满洲国阵亡的日本和伪满洲国的军人及警察。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由伪满洲国祭祀府管

① 小笠原省三:《海外の神社:並にブラジル在住同胞の教育と宗教》,神道评论社1933年版,第255—256页。

② 天照大神是《古事记》《日本书纪》神话中的最高神——太阳之神,被视为天皇家的祖神。大国主神是记纪神话中的苇原中国之主,被视为国土、地域的开拓神。国家神道将明治天皇视作现世的天照大神。

③ 堀江秀雄:《神道の满蒙进出》载《皇国时报》1932年2月1日,小笠原省三编述:《海外神社史》上卷所收,第107—109页。

④ 全国神职会、皇典讲研究所:《满洲国祀官养成所の計画》(1932年),小笠原省三编述:《海外神社史》上卷所收,第129—130页。

⑤ 山内祀夫:《满洲国神宫奉建计画书》(1932年),小笠原省三编述:《海外神社史》上卷所收,第131—133页。

籍,祭祀府的总督以及总务、祭务两处处长皆为日本人。因此,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实际上是日本国内的“伊势神宫和靖国神社的满洲版”^①,是日本神道界企图使中国人思想意识日本化的“满蒙精神中心”。

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神社,从其属性及所在地区来看,大致有4种类型,一是在关东军旨意下伪满政府所建的神社,如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二是关东厅及满铁所管辖和保护的神社,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的军事、经济要地,如奉天神社、抚顺神社、新京神社、吉林神社、公主岭神社、哈尔滨神社、齐齐哈尔神社、牡丹江神社等;三是日本移民开拓团所在地的神社^②;四是日本侵略军队驻营内的神社,如臭名昭著的七三一细菌部队所在地的东乡(平八郎)神社及中苏边境地区的守护神社等等。

(三)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华北和全国的神社设置

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军事上对外扩张的推进,祭政一致国家体制下的日本神道界,也是异常兴奋地分别在日本国内和中国展开活动。在日本国内,神道界中要求制订神职人员从军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皇典讲研究所的主事二宫正彰甚至具体地建议:在日本军队中的每个师团配备3名,每个兵站监配备2名,每个独立旅团配备1名从军神职人员,负责所属部队的祭祀、宣抚和教化,以鼓励士气。^③二宫正彰的要求得到陆军省的首肯,1939年8月15日,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下达了“陆达第42号令”,允许神职人员同“僧侣或教师”一样,在战时或事变之际随军。此外,在东京成立了“海外神社协会”,专门负责海外神社问题的调查研究、神主的培养和祭祀指导等。1938年12月,第1次近卫文磨内阁设立了以陆军、海军为核心的新的国家机构“兴亚院”(后被并入1942年11月所设的大东亚省),该机构以少壮军人、官僚占主导地位,是负责除外交以外的对华政治、经济及文化事务的机构。此后,在华神社的主管部门由外务省归属兴亚院,这表明神社完全纳入了日本侵华战争推进体制之中。

七七事变以前,在东北地区以外的中国广大地区,日本的神社主要被设置在日租界内,但是事变之后,日本政府和神道界紧锣密鼓地策划在中国各地建立神社,尤其是那些在军事、经济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城市。例如:“蒙疆的张家口;华北的北京、青岛、济南、天津、太原、石门、徐州;华中的上海、南京、汉口;华南的海口、厦门”等。^④

在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下,与外务省、大东亚省、拓务省等政府机关有密切关系的神职人员,开始对华北、华中的主要城市北京、天津、青岛、济南、南京等进行实地调查,并参与这些城市的神社设置活动。在战略要地和大城市神社的推进过程中,日本政府和神道界对北京神社的建立颇为重视,将北京神社视为日后在华所建神社的范例。根据小笠原省三的回顾:1938年夏,建立北京神社之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的驻京日军军方代表、大使馆总领事以及神道界的小笠原省三等人商议决定建造北京神社,并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官邸,举行了一次协商会议,会上,与会者一致同意成立“北京神社奉斋会”,以筹备神社的建造;当年的年底,北京居留民团人士携其拟定的北京神社建造方案到东京征求意见,为此,海外神社协会专门召开会议进行讨论,最后由明治神宫权宫司中岛正

① 村上重良:《天皇制国家と宗教》,日本评论社1986年版,第214—217页。

② 日本移民开拓团实行“一开拓团一神社”原则。开拓团神社的命名方式主要有4种:一是以所在的中国地名命名,如宝清神社、龙爪神社、八洲神社、哈达河神社等;二是以日本的地名命名,如埼玉神社、群馬神社、山梨神社、新潟神社、长野神社、爱媛神社;三是以开拓团员日本的原籍村名命名,如武田神社、諏访神社等;四是以反映当时思想意识的词语命名,如协和神社、弥荣神社等(参见嵯峨井建:《满洲の神社兴亡史》,芙蓉书房1998年版,第78—82页)。

③ 二宫正彰:《軍属祭官官制の必要を論ず》,《皇国时报》1934年9月16日。

④ 兴亚院:《支那に於ける神社に関する考察》(1940年12月),小笠原省三编述:《海外神社史》上卷所收,第274—284页。

国作出北京神社神殿建造案交给北京居留民团人士。^① 经过军、政、神道等多方面的共同运作,北京神社于1940年6月建成(位于东城贡院旧址)。作为“国家宗祀”,北京神社享受日本本土官国币社的待遇,所祭之神为天照大神、明治天皇及国魂大神。

除北京之外,日本在中国其他重要的大中城市也陆续设置了神社,有的城市甚至设置了两座以上。^② 一时间,日本神社遍布中国的广大区域,北自东北的兴安岭地区,南至香港、广州,东起青岛,西至包头、太原。

三 日本在中国广泛设置神社的战略意图

在日本的对外扩张侵略中,神道与军事武力、外交相并,成为日本巩固其对殖民地和占领地统治的重要手段。九一八事变以后,关于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统治,日本神道界有人曾明确地提出:日本对“满蒙的永久统制,不能只依靠武力,也不能只依靠外交”,而是“应在武力、政治和开放政策的基础上,更加注力于精神文化的移植”。^③ 所谓的精神文化移植,实质上就是强制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日本化,以达到殖民统治的目的。

前已叙及,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置的神社,大体上有4种类型,即伪满政府所建的神社、关东厅及满铁的神社、开拓团神社、随军神社。虽然各类神社都与日本对华的军事侵略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不同类型的神社,其设置意图也略有差异。

伪满政府所建的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名义上是伪满政府主唱的“满洲的神社”,但建国神庙所祭之神是日本的天照大神,所供神体是日本伊势神宫之物。显然,伪满政府的幕后操纵者——日本关东军用“惟神大道”构建了伪满洲国的“建国理念”。这表明建国神庙的设置不仅是所谓的“满洲国皇帝”与日本天皇“精神一体”的象征性建筑,而且与日本侵略者的强制推行天皇信仰、实施“皇民化”政策意图密切相关。

关东厅及满铁所管辖的神社大多被设置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经济要地。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侵略是以重要资源的开发为中心,以向日本运输钢铁、煤炭、液体燃料、金属、农产品等物资为目的,以满铁及满洲重工业开发等日本企业为核心推进的。由此,神社也被设置在交通要枢、重工业地带以及煤铁资源重地。这些神社作为日本军事经济侵略的守护神,所祭之神除天照大神、明治天皇、大国主神的不同组合以外,还常常并祭其他神灵。例如,抚顺神社和本溪湖神社祭祀矿山守护神金山比古神^④;辽阳神社祭祀食物神丰收大神;大连神社和铁岭神社祭祀靖国神。^⑤

开拓团的神社是日本实行“移民满洲”政策的产物。九一八事变以后,作为对亚洲、对中国东北地区战略中的一环,日本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将大批的移民送往中国东北地区。这些移民有的被安置在满铁沿线的周边地区,有的被安置在中苏边境地区,不仅从中国农民手中夺取耕地,而且部分开拓团还配备武装,成为对苏防御的军事辅助者。可以说,开拓团的移民不是简单的农业移民,而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实行殖民地统治的一股支持势力。为了不使这一势力产生离心力,开拓团实行“一团一神社”。开拓团神社的作用,从天理村开拓团向“驻满特命全权大使”梅津美治郎

① 小笠原省三编述:《海外神社史》上卷,第252—255页。

② 北京、上海以及交通枢纽或战略要道的天津、徐州、南京、山海关等地都分别设有2座以上神社。

③ 堀江秀雄:《神道の満蒙進出》《皇国时报》1932年2月1日。

④ 抚顺神社还并祭同为矿山守护神的金山比卖神。

⑤ 近代天皇制国家时期,以天皇名义进行战争(包括对外侵略的战争)而阵亡的军人被尊奉为“护国英灵”并加以祭祀,这些“护国英灵”也称之为“靖国之神”。

申请神社设立许可的申请书中可以略见一斑^①：

大东亚战争爆发，祖国的世界性使命加重之时，本村日本开拓民亦应分担使命、奉献报国
之诚之际，为了日益强国国民的信念、涵养殉国风尚、明确年少国民的国家观念，故策划设立神
社。又因，值此满洲国建国十年之佳年，广域的天理村依满洲国街村制而诞生，为使居住在村
内的原住民（引者注：指中国人）也和日本人同样参拜，涵养其敬神之念。

据此，清楚地看出，开拓团的神社扮演着日本殖民统治协力者的角色，不仅是通过神道礼仪强
化开拓团团员对“皇国”灭私奉公的信念、统制开拓团移民们思想意识的场所，而且还是企图使中
国人参拜神社丧失民族性、同化中国人思想意识的工具。

1940年7月，日本政府正式决定武力南进方针，妄图建立包括中国、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半岛、
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广大地区的所谓的“大东亚新秩序”。同时，日本政府也深知其南进政策
的推进，必然会激化其与英美的矛盾。9月27日，日本与德意两国结成军事同盟，做与英美交战的
准备。在扩大侵略战争的备战中，1940年12月，兴亚院作成一份名为《支那神社之考察》的报告。
《支那神社之考察》由“在支神社之本义”、“在支神社制度整备改善之基本方针”和“要领”三部分
构成。其中，第一部分具体地叙述了日本军部、政府在中国建造神社的战略目的^②：

其一，控制在华日本人的思想意识，提醒他们在侵华战争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所设置的在华
神社中，日本人对神祇威灵的崇敬，等视为贯彻“敬神尊皇大义”、发挥“国体精华”、昂扬“国威”、
辅翼“皇国”的“帝国臣民之道”。

其二，显现“肇国大精神”，象征日本神灵的“稜威”，使中国及中国人在神社“崇敬神德灵威，敬
仰皇祖皇宗的圣德”，顺从日本的“东亚新秩序”。

其三，“宣扬惟神之大道于宇内”，图谋在华日本人和中国人“同心同德”为“东亚秩序”尽臣
节，以达到巩固“东亚新秩序”的目的。

其四，“以皇道精神为中核的新文化”取代中国文化，使中国人丧失自己的文化。

由上可知，在华的神社是日本在政治上、文化上占领中国的标志性建筑，被用以象征“东亚新
秩序的建设”，也是日本妄图同化中国人意识的重要工具之一。这一点在日本驻北京总领事土田
丰所阐述的北京神社之作用中被表述得更加明确^③：

神社是我等日本民族发祥之始既有的惟神之道之最高体现。时逢创建东亚新秩序之际，
在华北古都北京的贡院遗址上斋奉神社一事，不啻是侨居日本同胞生存发展的可喜可贺之事，
而且实际上也是使中国4亿万民众还其本然之姿的巨大力量和源泉。即通过祭拜北京神社，
使其认识神国日本的壮丽形象；通过在神社前的俯首膜拜，消除其对立抗争的邪心，树立其和
衷协同的美好之心。

土田丰毫不掩饰地表露出日本政府欲以神道礼仪消除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军之志的妄想。

① 《天理村神社設立許可願》（1942年9月20日），转引自嵯峨井建：《満洲の神社興亡史》，芙蓉書房1998年版，第223—225页。

② 兴亚院：《支那に於ける神社に関する考察》（1940年12月），小笠原省三编述：《海外神社史》上卷所收，第274—284页。

③ 土田丰：《北京神社御創建に際して》（1940年6月22日电台放送），小笠原省三编述：《海外神社史》上卷所收，第264—266页。

由此,在华的神社所担负的侵华战争协力者作用也昭然若揭。

在华神社的侵华战争协力者角色同样反映在神社的分类上。与所谓的“东亚新秩序建设的成果”相对应,兴亚院把在华神社分为两大类^①:

1. 官国币社。与所谓的“东亚新秩序建设成果”相照应,被逐次设置在军事经济要地(如上海、青岛、天津、北京、张家口、济南、南京等)。其中又细分为三类:

(1)与皇室及日本国有特别密切关系的神社。

(2)永属“帝国威德”范围的广泛地域,如蒙疆、华北、扬子江下游三角地带、海南岛等地的“镇护”为第一要义的神社。

(3)永属“帝国威德”范围的地域中的一省、一盟或一特别市的“镇护”为第一要义的神社。

2. 由居留民团或民会供进神饌币帛料的神社;永属“帝国威德”范围的普通市县以下地区的“镇护”为第一要义的神社。

显然,尽管上述各类在华神社所“镇护”的对象各有不同,但从实质而言,各类神社都是与以祈佑日本永久占领中国为首要职能的。同时还应该注意的是,官国币社类神社均与日本的军事侵略扩张进程相呼应,被设置在军事、经济的要地。这再次表明神社不仅是日本在政治上、文化上侵略中国的标志,而且也是日本在军事上、经济上占领中国的象征,具有极强的军事侵略性质。

结束语

在国家神道的体制中,神社与国家主义结合成为国家的宗祀,祭祀是日本国家的重要政务之一。同时与当时的日本神国论相呼应,神社也被视作“惟神之道”、“八纮一字”的视觉性标志和日本文化的渊源、缩影。因此,国家神道不仅在统制日本国民思想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加入到对外侵略的行列中,在日本的殖民地和占领区广泛设立象征性建筑——神社,扮演着军国主义协力者的角色。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军部以及神道界在华设置神社的意图具有多重性。其一,在中国军事经济要地设立神社,旨在期待“众神镇护”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其二,神社被赋予了“肇国大精神”和日本神灵“稜威”等象征性含义,企图通过参拜神社的行为,同化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使中国人丧失民族性及其文化;其三,神社是统合在华日本人的精神纽带,力图通过神道礼仪,以强化在华日本人对天皇、国家绝对服从的观念;其四,神社作为所谓的“大东亚秩序建设成果”,即日本占领中国领土的标志,具有很强的军事侵略性质。

总之,在华的神社既是统制在华日本人思想意识的工具,同时也是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道具。如果说战争时代的日本是一驾疯狂的战车,那么军队和国家神道则是这驾战车的双轮。

(作者王海燕,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兴亚院:《支那に於ける神社に関する考察》,小笠原省三编述:《海外神社史》上卷所收,第264—266页。